

民初孔教会 与 国教运动研究

韩
华
◆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

韩华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韩华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13-3545-9/G · 725

I. 民… II. 韩… III. 社会思潮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422 号

书名 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

著者 韩华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套)

书号 ISBN 978-7-5013-3545-9/G · 725

定价 22.00 元

自序

这是一本关于民初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论著，其所涉及的是长期以来备受争论与困扰的历史性话题。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否有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中一个悖论性问题。一个几千年来信奉“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①的“礼”训教化下的国度，对各种宗教是宽容大度的。在“仁”“义”精神定义下的“民吾胞也”^②，宗教就发生在每天的生活内容里，是完全生活意义化的，一切“天不变，道亦不变”蕴涵在“天人合一”之中。而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大门时，生活化的宗教内容难以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天已变，道还存乎？中国人必须面对悲凉和惨淡的危局。学习西方，并力图从西方强大的事实中寻求救国良方，这是先进的中国人试图救国图强的惟一出路，而我正是怀着对那个时代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崇敬心情，开始阅读康有为、梁启超、陈焕章、梁漱溟、梁济、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等人的文章与专著，开始关注清末民初的孔教运动，并试图从孔教会及其发起之国教运动现存的史料入手，深入到这场发生于新旧文化交汇时期的运动过程中、以及参与运动的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之中，也试图考察当时社会各阶层对这场运动的反应，并由此展开对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真实辨析。

① 《礼记·中庸》。

② 张载《西铭·乾称篇》。

民初孔教会及其发起之国教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围绕着孔教是否宗教、是否定为国教等问题，许多思想流派和政治派别都做出了反应。这股思潮自兴起之时，即毁誉相随。对民初孔教会及国教运动，既有的研究多从政治史角度着眼，对其历史地位更多是否定，又因孔教会及其重要成员与民初帝制复辟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颇多微词。

有关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研究，大体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孔教会被史学界一概视为封建复辟逆流的反动团体，将孔教会定义为“是辛亥革命后一个专搞尊孔复辟的反动团体。孔教会聚集了一伙顽固的孔孟之徒和复辟狂人，妄图将孔学变成‘国教’强加给人民。它参与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依附北洋政府旧军阀，投靠国民党新军阀，反对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更反对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全部活动就是反对革命，反对进步，维护半封建半殖民的反动统治秩序”^①。这是当时对孔教会及国教运动具有代表性的评论^②。

这一时期对孔教会主要人物的研究也极为缺乏，如孔教会的重要人物之一陈焕章，在当时仅有郑则民撰写的一篇不足3000字的小传^③，对陈焕章的评价笼统、简单，这与陈焕章的身份极不相称。总的来说，70年代有关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研究，在当时“批林批孔”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因政治的干扰，其研究结论有简单化之嫌，很难说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研究。

与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70年代海外学者对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研究则显得中肯些，但尚无有关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专著

① 夏良才、王学庄《评孔教会》，《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第75—85页。

② 在同时期出版的刘望龄《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第1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一辑《中国近代尊孔逆流史事纪年》上篇（1841—1919）、第二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919—1949）（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版）等刊物，其所持观点与《评孔教会》一文所持的观点一致。

③ 郑则民《陈焕章传》，收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3—399页。

问世，但在与此相关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却多有涉及。如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该书在论及清末康有为建立孔教及发起民初国教运动时，称之为“致力于使儒学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①，从一侧面国教运动进行了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并受海外学人观点的影响，逐渐以比较全面的视角、比较平实的心态来看待这场运动，该时期随着史学界对戊戌变法，康有为、袁世凯等历史事件、人物的深入研究，一些论著更多地涉及到孔教会及国教运动。如孔祥吉在《康有为变法奏稿研究》一书中，将康有为建立孔教会视为模仿基督教的形式、基督教精神的“创教”活动，认为“康有为张扬孔教，是在精神上向西方学习”，给孔教运动一定的定性^②。一些民国史的论著也提到孔教会及国教运动，但更多是关于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大致介绍^③。

同一时期，海外学者对孔教会及国教运动也有更多的研究，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该论著从研究康有为的角度入手，论述了民初孔教会及国教运动，认为康氏建立国家宗教是为了“顺应帝国儒家综合体的分裂”，是“中国当代需要的一种社会适应”的“策略”，是“功利主义的考虑”，是企图将“孔子学说视为有用的现代信仰体系”^④。80年

①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06页。根据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译出。汪荣祖曾说：“欲窥康有为思想的全貌，最佳之作仍属吾师萧公权先生所写五十万字的《康有为思想研究》巨著，英文原版早于1975年出版……”因此，可以说萧公权此著作，系海外研究康有为思想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观点影响了后来研究康有为的学者，譬如，汪荣祖指出“他（康有为——笔者注）提倡孔教，总而言之，是强烈危机感的直接反应和行动”。《中华版弁言》，汪荣祖《康有为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3页。

②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稿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252页。

③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一卷（1912—1916）下，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1版。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一）北洋政府时期（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④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408—409页，第394页。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

代，随着港台学者对“新儒学”研究的深入，对孔教会及国教运动也随之涉及，如韦政通认为民初孔教会及国教运动是《新青年》反儒家运动的起因之一，“民初反儒家运动的出现，从历史的角度看，有远因亦有近因，西潮冲击属前者，帝制运动、孔教运动属后者”。《新青年》最初注意力“端在青年”，而在1916年9月后的《新青年》，已少谈青年，差不多都在讨论儒家与孔教问题，《新青年》之所以转向反儒家，是因为它的作者们认定儒家与帝制运动有不可分离的关系^①。傅伟勋认为，“儒家思想基本上不是一种宗教，但有从贯穿知识论、形上学、心性论与（包括政治社会思想与教育思想在内的）伦理学等四项的‘道德的理想主义’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儒家特有的解脱论，仍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宗教’（a moral religion），也可以说是一种富于哲理的‘生死智慧’，自孔子始，一直如此”。而由于儒家是“道德的宗教”，因此，“它对依从‘小传统’（宗教信仰）的人民大众来说，恐怕成义过高，难被接受。这就部分说明了儒家的‘道德的宗教’为何形成不了耶教或佛教那样极具解脱论或救济论影响的一种世界性宗教”^②。此结论，在一定层面指出了民初孔教会试图使孔教成为如基督教一样的宗教的不可行性。汪荣祖则指出，儒家中“经今文学家早于汉代就已神化孔子，何休这位公羊学者亦早已赋予孔子‘米赛亚的角色’（Messianic role），康氏本人也受到公羊学里纬书的影响。所以他要以儒为宗教，自有其儒家内在的因素，不必完全是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的启示”^③等等，上述诸论，对孔教会与国教运动有更深入的剖析。

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国内史学界对孔教会及国教运动逐渐有更多的关注，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从研究康有为着手，较深

① 韦政通《现代儒家的挫折与复兴》，收入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4月第1版，第81、83页。

② 傅伟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0、52页。

③ 汪荣祖《康有为论》，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第112页。

人论及民初孔教运动的专著是房德邻先生的《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该书从研究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历程出发，将其建立国教的主张视为“保守的民族文化主义运动”，对民初孔教运动的过程也有介绍，对本书稿的写作有较大的启发。但该著作毕竟不是研究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专著，对民初孔教运动未充分的展开^①。《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则系近年来涉及民初孔教运动较深刻的专著之一，其作者认为：民初“孔教会谋求在新的法律体制内为儒家寻求制度性保护，希望通过立法途径将孔教定为国教”，系“儒家重建制度化的另一种路径”^②。此外，近年来还涌现出研究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学术论文^③，其中不乏新见解、新观点。譬如，有学者以为民初孔教活动，是儒教是教非教之争在近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对孔子儒学的

-
- ① 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月版。
- ②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35页。
- ③ 刘萍《康有为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邱巍《民初孔教会及孔教运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2期。黄俊岭《论清末民初的“定孔教为国教”运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苏中立《论世纪之交的孔教问题大辩论》，《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韩华《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李超民《从翰林到博士：陈焕章〈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张卫波《论民国初年陈焕章的尊孔思想》，《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邱巍《民初的西儒与孔教会》，《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何社林《康有为与民初尊孔运动》，《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罗会光《谈传统文化与民初孔教运动的兴起》，《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李建《20世纪初期关于儒学宗教论的批评》，《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干春松《康有为和孔教会民国初年儒家复兴努力及其挫折》，《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干春松《清末民初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换的困境》，《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干春松《近代中国人认同危机及其重建——以康有为与孔教会为例》，《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方艳华《民初山东孔教会及其活动》，《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2期。邓亦武《民初复古尊孔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阜新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喻大华《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判释误区，以及直接的政治目的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①；再有学者认为康有为倡导立儒学（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与尝试^②，等等。但是，迄今学术界仍未有一本系统、完整的关于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专著问世。

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是20世纪新旧思想文化激荡、冲突和争论的主题之一，尤其是20世纪初期传统文化在政治冲突和文化激荡背景下，其价值趋向和发展走向出现复杂的各种文化力量之间的较量，因此，我把孔教会及国教运动放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文化史的角度，从尊孔思潮历史演变与传统思想现代性转换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视点出发，发掘史料、重建史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唯物史观的态度，我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尊孔系复杂的文化现象，从尊孔出发，可以走向复古，也可以走向革新。既有的传统精神能否从西方文化形式中获得新的意义，天已变，道亦被迫变，不同类型、不同目的人物聚集在孔教会麾下，在民初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天塌地陷”的突变，试图在新的历史局面下构建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本书从社会阶层、文化主张等角度对孔教会各类组成人员作了类型划分，对孔教会组成人员对传统文化所持的各种立场进行了剖析，希望有助于把握孔教会及国教运动的内涵与实质。

二、长期以来，学术界曾一直将孔教会及国教运动，视为是配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组织及运动，将孔教会为建立国家宗教而极力鼓吹孔教，视为在思想领域为袁世凯复辟摇旗呐喊。如有学

① 韩星《清末民初孔教活动及其争论》，《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刘雪飞《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者指出“这个研究会（孔教会——引者注）是袁世凯帝制运动最热衷的支持者”^①；而有的论著虽指出袁世凯不赞成国教，但却笼统地将孔教会定位在“阴谋复辟帝制”的位置上^②。等等，这些结论，虽不无道理，但与史实存在一定的偏差。本书辨析了孔教会与袁世凯复辟帝制二者间的关系，从袁世凯对国教、孔教、孔教会的态度、孔教会诸公与袁世凯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孔教会主要人员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态度，逐一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孔教会成员的政治立场十分复杂，梁启超、陈焕章、康有为、沈曾植、劳乃宣等不同类型的人物在同一组织中存在，却在政治上自行其是，表明国教运动思想家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就是康门师徒，主张亦趋两途，康有为以清帝复辟进而实施君主立宪制度为念，梁启超则致力于改良并推进已经建立的政制，陈焕章则游离于两者之间，但相对偏向于“学长”而不是“恩师”。而袁世凯的态度并不单一，他标榜尊孔，但不赞成国教，对国教运动甚至加以防范限制。事实表明，国教与复辟两种势力，貌合而神离，虽“同床”，实多“异梦”，至少就梁启超、陈焕章等人与帝制派的关系来说是这样。

三、探讨了袁世凯与国会讨论国教案的关系，既有研究认为国会对国教案的持久讨论与袁世凯操纵国会有关，本书对当时组成制宪委员会议员的党派划分及其对孔教定为国教的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袁世凯在当时背景下破坏国会的直接动机，试图厘清袁世凯与国会讨论孔教案二者间的关系。就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嬗变的角度视之，民初国会在制宪过程中对国教案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国会对孔教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是因国会制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403页。

② 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一卷（1912—1916），中华书局1987年9月版，第535页。

宪诸公在制宪过程中必然面对、解决的问题——在完全迥异于西方文化特质的中国文化土壤上移植共和政体时应该考虑的问题：既有民族文化精神与体现新政体精神的宪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起，而对该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废除尊孔读经条例，以及民初宪法颁布诸如“信教自由”约法条款而触及中国社会公众普遍的信仰问题而致使条例的推行与宪政的实施不如人意的根源。

四、剖析了孔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对立统一的因果关系。国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均是发生在民初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重要运动，二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前者以保守求发展，试图从历史的传统精神境界中寻求新精神支柱的建立，后者以破坏求发展，企图以科学和民主获求填补时代发展出现的精神真空。二者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国教运动的开展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后者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使中国文化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新文化运动批驳孔教却又关注国教运动企图解决的信仰重建、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而国教运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的辩难指责时，在客观上对其偏激的做法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二者的矛盾冲突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五、结合民初背景，论证了孔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本书收集、梳理孔教会及其他同期宗教组织所办刊物的资料，将对立双方的资料进行对照比较，以考证史实。在国教运动中，支持孔教为国教的《宗圣杂志》刊登了有关道教组织上书支持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宗圣杂志》所载史实是否属实？是否存在制造舆论的嫌疑？查阅反对孔教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圣教杂志》，结果该刊载有谴责道教组织上书、请愿定国教的通电，且在时间上也吻合，这与既存研究认为“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机构”对

孔教会建立国教“很反感”^①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当国教案公之于世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从当时的处境出发，也并非完全反对国教。辨析民初佛、道二教对孔教的态度，有助于理解民初中国社会“一切人伦关系，从婚丧礼俗到岁时节庆，大体上都遵循着儒家的规范而辅之以佛、道二教的信仰与习行”^②的格局。当时孔教徒、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的活动表明，在国会内外，国教与非国教之争，主要反映在孔教徒与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之间，国教运动中孔教与其他宗教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表现为孔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在实质上则是中西文化之争。

此外，本书对民初孔教运动的积极层面，如对现实问题的人文关怀、对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爱护弘扬，以及对在国教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等方面，在做出适当评价的同时，对这股思潮的不合时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在客观上为帝制复辟推波助澜等问题上，也进行了批判。

本书分上篇、下篇，书后附年表、书目。上篇以时间为线索，共分为六章，叙述了孔教会与国教运动发生、发展、尾声的整个过程。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古史研究理论，以解开人为的“层累”而再现古史真面目，本书力图拨开笼罩在因对孔教会及国教运动本来面目并不完全清楚的前提下得出的一些结论的迷雾，力图再现国教运动的总体情况和具体细节。

下篇以问题为中心而展开，共分七章，分析国教运动中涉及的重要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证，结合上篇的史实叙述，试图在厘清国教运动的基本事实基础上，展现民初孔教运动的表与里，整理、分析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希冀给孔教会及国教运动恰当的定位。

①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104页。

②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序言。

由于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问题较多，仅就学科而言，就大体要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再加之相关资料比较分散、有的记载略而不详，要驾驭这样一个涉及多学科知识的题目；要从这样一个在当时就有较大争议，而至今仍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论断，对我是巨大的挑战。本书虽然作了一定的探索，但仅是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而其中涉及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由于学识和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但本书的研究倘能引起学界的关注、争论与批评，并对深入研究清季民初的社会与思想有一定的裨益，对我来说将是莫大的安慰。

目 录

自 序

上 篇

第一章 民初孔教的命运	1
一、废除尊孔读经及其社会反响	3
二、“信教自由”约法条款下的孔教困境	23
三、民初信仰危机	28
第二章 康有为与陈焕章的孔教思想	39
一、康有为重建儒学的努力与孔教思想的来源	39
二、康有为孔教思想的初步形成	44
三、康有为孔教思想的实践及其完善	48
四、陈焕章的孔教思想	54
五、陈焕章《孔教论》：民初孔教会的纲领性文件	65
第三章 国教运动的酝酿	70
一、孔教会的成立及组织机构的扩大	71
二、创办孔教会机关喉舌报：《孔教会杂志》	81
第四章 国教运动的潮起潮落	85
一、第一次国教运动的兴起（1913—1914 年）	87
二、国教运动的再度兴起（1916—1917 年）	104
第五章 孔教会在国教运动中开展的活动	117
一、1913 年全国孔教大会及国子监丁祭	117
二、建立孔子的教主地位	133
第六章 国教运动失败后孔教会昌明孔教的努力	139
一、向参众两院提出尊孔议案	139

二、创办《经世报》	144
三、创办孔教大学及修建孔教总会堂	147

下 篇

第七章 孔教会组织机构及孔教会组成人员分析	164
一、孔教会组织机构	164
二、孔教会组成人员	182
第八章 参众两院对国教问题的讨论	196
一、1913 年参众两院对国教问题的讨论	197
二、1916—1917 年参众两院对国教问题的讨论	199
三、参众两院对国教问题讨论的反思	213
第九章 国教运动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孔教是否是宗教	222
一、孔教是宗教	223
二、孔教非宗教	227
三、辩论留下的思考	232
第十章 国教运动中孔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238
一、两次国教运动中基督教与孔教的关系	239
二、其他宗教对孔教的回应	249
第十一章 孔教会与帝制复辟关系辨析	255
一、孔教会对待帝制复辟的态度	256
二、袁世凯对国教的态度	260
三、国教与帝制关系辨析	264
第十二章 国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辨析	273
一、新文化运动对国教运动的批判	273
二、国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互动	279
结语：国教运动的反思	288
附 录	303
附录 1：孔教会与国教运动大事年表	303
附录 2：参考文献	312
后 记	325

上 篇

第一章 民初孔教的命运

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神圣典章，成为皇权的意识形态——官学，它规范人们的一切观念、言论和行为模式，并杜绝与其价值不一致的思想和学术，形成独尊的局面。两千余年，虽然随着时势的变迁，儒学也随之有所演变，但却始终未曾改变作为“政治社会”之意识形态的角色^①。

延至清代，儒学定于一尊的状况依然未曾改变。有清一代，历朝皇帝对儒学的推崇无以复加。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天朝上国”的大门，儒学高居庙堂、被奉为正统的命运随之受到严重挑战。

鸦片战争以后的数次对外战争，多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国家主权日渐丧失、领土被蚕食，国破民敝，危机四伏。于是，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新文化运

① “秦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陈寅恪《审查报告三》，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440页。

动，经历了从器物到政制，再到思想文化^①，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而中学之“体”正是在逐渐引进“西用”的过程中解体，作为中学之“体”的儒家纲常伦理政制，也被迫从“中国思想权势”的中心，走向了边缘^②。

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历史的发展越出了以往改朝换代的轨迹^③。一向被奉为“正统”、作为维系君主政体意识形态的儒学，也随着“作为这个儒教社会的中枢”君主制的寿终正寝^④失去了其“正统”的地位，这意味着儒学所维系的政治秩序的崩溃。

陈寅恪认为儒家学说同中国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并使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余英时也持类似的论断，“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传统中国“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儒家原则^⑤。

由于儒家文化对“法律制度公私生活方面”久长深远的影响，中国政治、社会秩序长期囿于“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中。然自晚清西潮拍岸始，“二千年传统之政治观念，经新思潮之冲激，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

② 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及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4—55页。

③ 冯自由指出：在兴中会之前，如台湾朱一贵之兴中会、林爽文之天地会、白莲教等“皆可谓之革命党”，然其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而只有兴中会开我国历史之先河，“揭橥民族民权两大主义”，以建立共和、民主为目的。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

④ [美] 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40页。

⑤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收入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页。